

张齐政 邓胤龙 主编

船山研究新论



岳麓
上

张齐政 邓胤龙 主编

船山研究新论



岳麓書社·长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船山研究新论/张齐政,邓胤龙主编. —长沙:岳麓书社,2017.6

ISBN 978-7-5538-0551-1

I. ①船... II. ①张... ②... III. ①王夫之(1619—1692)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4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7091号

CHUANSHAN YANJIU XINLUN

船山研究新论

主 编:张齐政 邓胤龙

责任编辑:刘 文

责任校对:舒 舍

封面设计:罗志义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47号

直销电话:0731—88804152 88885616

邮编:410006

岳麓书社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17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640×960 1/16

印张:19.5

字数:310千字

ISBN 978-7-5538-0551-1

定价:42.00元

承印:长沙宇航印刷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工程”项目

“湖南省资助优秀理论期刊”资助项目

湖南省王船山研究基地成果

湖湘文化·湖湘学·船山学

——代序言

张齐政

几年前，本人曾对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兴起，并迅速成为学者们研究热门和显学，而且持续升温势头不减的地方文化史下了一个不成熟的定义：“地方文化史也可称为地域文化史或区域文化史，主要是对某一地区的历史文化现象进行系统研究的一门专史，是地方史研究的一个分支，是文化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一门历史科学。它的研究既可以寻求出中华文化发展的共同轨迹，也可以找出各个不同地域文化的不同差异和各自的特性。”^[1] 这种观点被学术界所采纳。^[2] 依此来说，“湖湘文化”当属区域文化史范畴。

那么，何为“湖湘文化”？其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我们认为：湖湘文化为一种区域性的文化，是指一种具有鲜明湖南特色的、相对稳定并具有传承关系的地域性的历史文化形态，是由中原的儒家文化结合本土文化而形成的。其研究的对象包括湖湘大地上所有的历史文化形态及其变迁、湖湘文化的特色及其基本精神。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湖湘历史、湖湘哲学、湖湘语言文学、湖湘艺术、湖湘教育、湖湘宗教、湖湘民风民俗、湖湘科学技术、湖湘代表人物、湖湘经济、湖湘地理、湖湘精神等等。

“湖湘学”，又称“湘学”，也可称之为“湖湘学派”。它产生于理学南传的胡安国父子，是道学南传的结果。胡氏父子的学术思想，皆渊源于北宋的二程之学。“二程之学，龟山（杨时）得之而南，传之豫章罗氏（罗从彦），罗氏传之延平李氏（李桐），李氏传之考亭朱氏（朱熹），此一派也。上蔡（谢良佐）传之武夷胡氏（胡安国），胡氏传其子五峰（胡宏），五峰传之南轩张氏（张栻），此又一派也。”由此可知，二程之学分两支向

南传播发展。一支从杨时经李桐到朱熹,这一派为“闽学”;另一支从谢良佐经胡氏父子到张栻,这一派为“湖湘学”。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湖湘学派肇始于宋明理学的开山人物周敦颐。不管哪种观点,湖湘学的历史已有千年的历史。然而,多年来,人们对于“湖湘学”所下的定义不是很清晰,也不是很科学,所以,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就此对学界提出过希望:“由于对于‘湖湘学派’的涵义的解释仍然存在着歧义:抑或是一种学术思想、儒家学派,还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地域精神;或者其对象与主体是仅指湘籍本土人物,还是与湖南学术思想有关的一切文人学者?对此还没有人作出一个准确的表述。我们认为,也期盼湖南的学者们对此展开一些讨论,以求得出一些比较一致的意见,更好地促进湖湘文化及其与湖南地域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研究。”^[3]“湖湘学”应该是湖湘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科,是湖湘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喜的是,进入新的世纪后,湖南对湖湘学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和突破,学界对“湖湘学”有了比较科学的界定。在这里,著名学者方克立先生在湖南省湘学研究院专家顾问北京座谈会上讲话中的意见是值得肯定的:“严格的学理意义和作为一种地域学术传统的湘学,是指从两宋到清末,在湖南地区产生和发展的一种将儒家的性理哲学与经世之学相结合,主张体用合一、‘内圣’与‘外王’并重的学术形态,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千年湘学’‘传统湘学’。这应该是湘学研究的主题内容和核心内容。”“湘学是一个有特定内涵和时空范围的学术思想史概念。它是中国传统学术即‘国学’的一部分,具体说是中国儒家、宋明理学的一部分,与濂、洛、关、闽、江西之学,浙江婺学等地域学术传统一样,都是属于宋明理学中的不同学派。从两宋到清末,湘学学者都认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尊崇宋明理学,坚持儒家道统,这是决定其学说、学派性质的一个基本特点。另一方面,湘学又有自己的独特个性,就是反对空谈道德心性,主张‘学贵力行’、经世致用,提倡实事实功之学,它是宋明理学中很有特色的一个学派。”

“船山学”的存在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而“船山学”的概念的出现,如果从王闿运的著作算起,也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从严格的学理意义上讲,所谓“学科”,是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学科一般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研究对象、研究特征、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学科的派生

来源。所以，“船山学”作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来讲，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根据王兴国先生的说法：“将船山学作为一门和‘朱子学’‘阳明学’一样的独立学科来进行研究，则是在1982年王船山学术研讨会上，最早由方克立教授提出来的。他说：‘船山学是一门以我国17世纪著名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夫之生平活动和学术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新学问。’”

^[4] 后来，学界基本上沿袭此表述，无太多异议。所不同的只是对其研究内涵和外延的深度与广度的界定不一而已。王兴国先生认为：“现在船山学的发展已经大大越出了这个定义的范围，因此我觉得除了船山的生平和学术思想之外，一切与船山有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均应列入船山学的视野。”^[5] 徐孙铭先生认为：“船山学的内涵，从广义上说指船山哲学、史学、道德伦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艺、美学思想。从狭义上说，指在湖湘学派视野下，与开经世致用和实地考察先河的顾炎武、提出具有启蒙色彩的民主法治思想的黄宗羲相媲美，对中华传统思想文化进行系统总结概括的‘趋时更新’之学。”^[6]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船山学”是“湖湘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和重要研究对象，也是湖湘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2年，《衡阳师范学院学报》“船山研究”栏目有幸被评为“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成为第二批“名栏工程”入选期刊。在评审答辩中，评委们曾问及到，船山学的研究已有上百年的历史，现在是否还有可持续研究发展的可能性，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开创船山学研究新的局面。当时问题提得仓促，本人思考不太全面，认为船山学研究的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应该从以下五个方面努力：（1）王船山思想的比较研究；（2）王船山思想的当代意义；（3）王船山思想与当代各学科的发展研究；（4）王船山思想研究本身学术史的梳理与研究；（5）王船山佚文的发掘与考证以及王船山形迹与生活居住过的旧居遗迹考证。虽然本人的研究重点是中西古典文明和湖南地方文化史，对船山学的研究鲜有触及，这只是从事该方面文章的编辑工作的心得而已，所以意见很不成熟。即使这样，这种意见还是被学者们所首肯。

前不久，重读一些有关王船山研究的文章，还是觉得王兴国先生提出的船山学研究对象和内容比较全面，现摘抄下来，供从事船山学研究的学者们一起借鉴：“1. 船山的生平、行迹、事迹研究，船山历史遗迹、文物

的保护研究;2.船山的家庭、亲属和师友以及他们对于船山的影响研究;3.船山著作的写作和刊刻、出版情况的研究,船山著作佚文的继续收集整理;4.船山各方面学术思想的专题和综合性研究,船山生平和学术思想研究中有争论问题的研究;5.船山思想渊源、影响及其在世界思想史、中国思想史和湖湘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的研究;6.船山研究方法论的探讨和研究;7.船山思想现实意义的研究,除了船山思想品德的现实意义的研究之外,还应包括船山历史遗迹文物及船山学、船山学社品牌的开发利用研究;8.船山学发展的历史阶段及各阶段历史特点的研究,不同历史阶段中一些对船山学有贡献的代表人物及有代表性的著作的研究;9.从思贤讲舍到船山学社等国内有关船山的教育和学术机构的研究;10.从民国时期的《船山学报》到当代的《船山学刊》,包括《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的船山研究专栏的研究;11.国外及港台船山学的情况及其特点的研究;12.船山思想和著作的普及推广的研究;13.船山学的未来发展和展望的研究。”^[7]

在湖南,目前进行湖湘文化、湖湘学和船山学研究的学者不少,中间也不乏一些大师级的人物。除了各高校和社科院的学院派学者之外,各地还有大量的民间湖湘文化研究者。从学术机构来看,全省有湖湘文化研究会、湘学研究院、王船山研究会、船山学社,各个高校和各个地市州都有湖湘文化研究会或者研究所;衡阳不但有王船山研究会,还有大学生王船山研究会;从学术刊物名称来看,有充满着湖湘文化韵味的《毛泽东研究》《湘学》《湘学研究》《湖湘论坛》《船山学刊》《云梦学刊》《武陵学刊》等,看其刊名,就知其主要研究内容;从学术刊物所设置的栏目来看,有一大批是为了研究湖湘文化而设置的,如教育部高校文科学报名栏工程《书院研究》《船山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湖南省期刊优秀栏目《毛泽东研究》《曾国藩研究》《丁玲研究》《沈从文研究》《湘籍将帅》《湖湘文化研究》《衡岳文化研究》《梅山文化研究》《舜文化研究》《德文化研究》《瑶族文化》《濂溪学研究》《江永女书研究》等等。全方位地展现了湖湘文化的魅力以及研究成果,也表明了湖湘文化、湖湘学和船山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张齐政:《当前地方文化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衡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8年1期。

- [2] 曲彦斌：《区域性文化史如何写——〈辽宁文化通史〉主编札记》，载《文化学刊》2011年2期。
- [3] 张齐政：《南岳寺庙建筑与寺庙文化》前言，第8页，花城出版社，1999年。
- [4][5][7] 王兴国：《关于船山学科建设的两个问题》，载《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4期。
- [6] 徐孙铭：《对构建〈船山学术概论〉的几点思考》，载《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4期。

目 录

船山批评阳明学的三个层次及检讨 / 张昭炜	001
由“踵息”看船山的精神趣味及思想深度 / 张昭炜	020
王夫之礼以化民成俗与乐以移易性情的礼乐教化思想 / 陈力祥	035
论王船山人欲失其和思想及其矫治 / 陈力祥	046
船山关于人之善恶差别的思想 / 孙钦香	057
论王夫之和合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 谢 芳 王学锋	064
论王船山的经济伦理思想 / 谢 芳	071
“顺乎天则”与“延天以祐人”	
——王船山关于人的受动性与能动性思想 / 肖起来	077
论王船山的和谐审美观及其当代价值 / 周芬芬 周晓阳	083
当代道德视域下船山思想的启示 / 石朝辉 段建辉	089
王船山数责朱熹“过于忠”论的原因探究 / 杨兴华	095
论王船山改革思想中的民生关怀 / 王利民	101
船山学说之我见 / 姜建国	107
王夫之情景相生论的哲学依据 / 彭正华	112
仙凡之隔：船山诗学视域中的二曹诗歌 / 秦秋咀	118
王船山诗歌退化论刍议 / 曾也鲁	130
王船山“情景”诗论源流辨析 / 陈 勇	138
王夫之对谢灵运诗歌的批评 / 傅宝龙	148
船山之诗歌节奏观简议 / 杨宁宁	154
王船山《说文广义》词义训释特点论略 / 李建清	162
《楚辞通释》的诠释特色与其在清代的影响 / 杨兴华	174
《说文广义》与清代说文研究 / 彭巧燕	179

《说文解字》与《说文广义》虚词对比研究 / 彭再新	191
新发现的王夫之《文选评》批点本考略 / 戴述秋 熊考核	
周安林	207
王船山与维科的历史进步观比较研究 / 张齐政	212
王夫之论地理条件与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演替之关系	
——读《黄书》札记 / 陈安民	222
王船山的军事思想及其对近代湖南历史人物的影响 / 罗玉明	
刘建辉	229
周敦颐王船山德育思想之比较 / 李佩桦	243
王船山教育思想传播及其研究 / 朱迪光	249
以王船山研究为契机，促进海外及台港澳地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认同 / 张齐政	258
论王船山的豪杰人格 / 肖剑平 陈元桂	273
比较视野与船山学研究的得失 / 朱迪光 朱缙君	283
王夫之与南岳莲花峰 / 谭民政	292
后 记	298

船山批评阳明学的三个层次及检讨

张昭炜

一

王阳明以立言、立德、立行三不朽显赫于明代，阳明后学风行天下的展开及与其他学派的交锋是明代中后期儒学发展的主旋律。随着清军入关、明朝亡国，阳明学迅速归于沉寂。王船山是明亡的见证者。他痛定思痛，将明亡迁罪于阳明学：“慨明统之坠也，自正、嘉以降，世教早衰，因以发明正学为己事”，“至于守正道以屏邪说，则参伍于濂、洛、关、闽，以辟象山、阳明之谬，斥钱、王、罗、李之妄，作《思问录内外篇》，明人道以为实学，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1]钱王罗李应分别指阳明后学钱德洪、王畿、罗汝芳、李贽，并以此四人概指阵容庞大的阳明后学。钱德洪、王畿是浙中王门代表，罗汝芳、李贽是泰州学派的代表。浙中王门、泰州学派是阳明学发展最为迅速的学派，也是阳明学堕落最早、最快的两个学派。二者的流弊也正在于荡于玄虚，溺于高妙，重妙悟而略躬行。前人对船山批评阳明学已有所论及^[2]，但尚未系统，并且倾向于站在船山的立场上指责阳明。有鉴于此，本文以阳明学基础上的反思为导向，从三个层次归纳总结，即直接攻击、经典诠释上的指正、阳明学核心宗旨的批判。船山批评阳明学的目的是重建正学，这是阳明学健康发展的重要参照系，亦可借此深入理解船山学说。

二

船山直接攻击阳明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人格的攻击、阳儒阴释、明代亡国的祸根。对于阳明的人格，船山予以痛斥，并延伸至阳明后学：

无誉者，圣人之直道，而曲成天下之善即在于此。誉则有过情之言，因而本无此坚僻之志者，以无知者之推崇而成乎不肯下之势，则力护其名而邪淫必极。如阳明抚赣以前，举动俊伟，文字谨密，又岂人所易及！后为龙溪、心斋、绪山、萝石辈推高，便尽失其故吾。故田州之役，一无足观。使阳明而早如此，则勦刘瑾、讨宸濠事亦不成矣。盖斥奸佞，讨乱贼，皆分别善恶事，不合于无善无恶之旨也。翕然而为人所推奖，乃大不幸事。孔子自颜子无言不说、子贡力折群毁外，他弟子皆有疑而相助之意，不失其闾闾、侃侃、行行之素。固当时人才之盛，亦圣人之熏陶学者，别是一种气象，自不至如蜂之绕王，薨薨扇羽也。况德未立，学未成，而誉言至乎！闻誉而惧，庶几免夫！^[3]

阳明在事功方面是卓绝的，德立、学成、经世超群，并得以从祀孔庙，受到后人的尊崇。但现实对于阳明是残酷的：阳明平定朱宸濠叛乱，遭到的却是江彬、许泰等小人的忌妒，声称阳明与宸濠同谋，最终还是将平叛的荣誉转嫁给了武宗；阳明晚年怀绥思恩、田州，破八寨、断藤峡，在阳明为国鞠躬尽瘁时，得到的是桂萼等人在皇帝面前的中伤。对于阳明，不是誉有过情之言，而是荣誉失情。阳明不但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荣誉，反而因功高蒙受黯哑之冤。即使阳明平宸濠叛乱的功绩被认可时，阳明闻誉而惧，视蟒玉之荣如尘土。作为一代大儒、史学家，船山不可能不对阳明的经历有清楚的了解，反而以“力护其名而邪淫必极”攻击阳明，矛头直指阳明学说。船山尊敬抚赣以前的阳明：“文字谨密”，说明船山认可阳明早期学旨；“举动俊伟”，说明船山对于阳明事功的推崇。在平定宸濠叛乱后，船山认为阳明的学旨尽失，“田州之役，一无足观”，事功不值一提。单从事功而言，阳明晚年的事功仍然卓绝，与早年的用兵如神并无二致。船山之所以如此评价阳明，其深层原因在于阳明学说宗旨的变化。阳明在龙场悟道时倡导知行合一，在巡抚南赣时教学者存天理灭人欲。在讨宸濠，经江彬、许泰之难后，有致良知之说，怀绥思恩、田州前则有天泉证道。船山能够接受阳明讨宸濠前的学说宗旨，却激烈反对讨宸濠后的学说。

船山不仅指责阳明本人，并且延伸至阳明后学。“龙溪、心斋、绪山、萝石”是阳明后学发展的四个方向：王畿（龙溪）与钱德洪（绪山）分别

侧重四无与四有，王艮（心斋）强调顺适自然，董沅（萝石）则颇具隐逸之风。作为阳明看重的弟子，“龙溪、心斋、绪山、萝石”四人推高阳明自是常理，并且朝不同方向推进阳明学，其学说也各具特色。孔门弟子表现各异：颜子无言不说，闵子阊阊，子路行行，冉有、子贡侃侃，他们既展现了孔门弟子人才的盛况，表现了孔子因材施教的熏陶，同时又预示了孔子后儒分为八、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如同孔门弟子推高孔子一样，阳明弟子自然要推高阳明。船山对于阳明后学批评的关键在于阳明是否能够在推高时不为誉言所动，其弟子是否如蜂之绕王一样，仅会薨薨扇羽，没有自己的学说特色。纵观《明儒学案》，不仅是龙溪、心斋、绪山、萝石，其他如聂豹、罗洪先、邹守益、王时槐、万廷言、罗汝芳等阳明后学，不仅如同孔门弟子一样性格各异，而且在学说方面也各具特色，从不同方向深层次提升、深化阳明学。船山对于阳明乃至后学讥讽显然是情过于理。

船山批评阳明学阳儒阴释，“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4]，“为浮屠作率兽食人之俦乎！”^[5]将阳明学排除在儒家正统之外：

于是而以无善无恶、销人伦、灭天理者，谓之良知；于是而以事事无碍之邪行，恣其奔欲无度者，为率性而双空人法之圣证；于是而以廉耻为桎梏，以君父为萍梗，无所不为为游戏，可夷狄，可盗贼，随类现身为方便。无一而不本于庄生之绪论，无一而不印以浮屠之宗旨。……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故张居正蹙天下于科条，而王畿、李贽之流，益横而无忌。何也？夫人重足以立，则退而托于虚玄以逃咎责，法急而下怨其上，则乐叛弃君亲之说以自便，而心亡罪灭，抑可谓叛逆汨没，初不伤其本无一物之天真。由此言之，祸至于申、韩而发乃大，源起于佛、老而害必生，而浮屠之淫邪，附庄生而始滥。端本之法，自虚玄始，区区巫鬼侈靡之风，不足诛也。^[6]

船山批评阳明学是佛老流弊的集成，阳明学打着儒学的幌子，兜售的却是佛老的学说。之所以如此，“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在船山看来，张居正推行法家政策，而阳明后学则为佛老，二者相沿以生、交相为害，葬送了大明王朝。从阳明后学的发展来看，以张居正为首的反对派沉重打击了展开正盛之际的阳明学：“比江陵柄国，即首斥讲学，毁天下

明贤书院。”“凡讲学受祸者不啻千计。”^[7]禁讲会、毁书院，以胡直、罗汝芳、邓以赞、张元忬、杨起元、汤显祖等为代表的阳明学者与首辅张居正之间针尖对麦芒，势不两立，乃至廷杖邹元标，杀死何心隐。随着胡直、罗汝芳、邓以赞等人纷遭罢免，阳明学逐渐失去了在政府讲学的话语权，阳明后学的讲学运动陷入低谷。

阳明学并未因张居正的残酷打击而归于沉寂，阳明后学的泰州学派、浙中王门的学说却在民间广泛传播。面对现实的残酷，普通民众更需要一个精神的家园作为归憩，而王畿倡导的四无说、泰州学派李贽等人的任情说得到了发展。阳明学有其内在的发展理路。如果没有张居正的打击，黔中王门的知行合一、江右王门的收摄保聚等或许与泰州学派、浙中王门一同发展。阳明后学之间有着相互批评、互相促进的学风，而这一切同样受到打击。船山看到的是张居正与阳明后学的泰州学派、浙中学派的这种不相容但又各自向极端发展的局面，现实是让整个社会尽收法家与佛老之弊。既然承认“其上申、韩”与“其下佛、老”的因果关联，那就不应该将过错完全归因于阳明学。

对于阳明而言，他以儒学涵盖佛老，如其所云：“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8]以阳明的气魄，尚能包裹二氏，但在阳明后学中，不染世累等思想的发展反而冲淡了儒家本有的圣学。“今之学者（姚江之徒），速期一悟之获，幸而获其所获，遂恣以佚乐。”^[9]从这一点上而言，船山对于王畿、李贽等阳明后学的批评是有依据的，但是船山“销人伦、灭天理者，谓之良知”的批评则不仅与阳明本人的学说相反，而且王畿、李贽等人亦极力反对。

船山不仅从人格上对于阳明进行攻击，从学说宗旨上将其排出儒家正统，而且认为阳明学简直就是明代亡国的祸根：

王氏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无忌惮之教立，而廉耻丧，盗贼兴，中国沦没，皆惟怠于明伦察物而求逸获，故君父可以不恤，肤发可以不顾。陆子静出而蒙古兴，其流祸一也。^[10]

近世小人之窃儒者，不淫于鬼而淫于释，释者，鬼之精者也。以良知为门庭，以无忌惮为蹊径，以堕廉耻、捐君亲为大公无我。故上鲜失德，下无奸宄，而萍散波靡，不数月而奉宗社以貽人，较汉之亡为尤亟焉。^[11]

船山将明亡归结于阳明学的流祸，显得过于偏激。^[12] 陆九渊的学说与宋代并无因果关系。明代灭亡原因是多方面的，正如萧公权先生指出的，仅在政治上，明亡的原因便有吏事、兵制、开矿、田赋四个主要弊端^[13]，这四个弊端可以说是与阳明学毫不相干，将明亡完全归罪于阳明学的论点显然过于武断。另如船山本人所论，“前代之亡，皆以国无人而致败。唯本朝不然”。诸大臣皆为阉党所摧折，“诸君子才一运肘，即为所掣，唯一死谢国而已”^[14]。在船山看来，阉党是造成明亡的主要原因，这与归罪于阳明的观点自相矛盾。

尽管明代亡国与阳明学没有直接的因果关联，但不可忽视阳明后学流弊对于晚明思想界的冲击。正如船山所指出的，阳明学危害最大的代表为王畿、李贽。阳明后学门派众多，其中以浙中王门、江右王门、泰州学派、止修学派为主。从学派归属而言，王畿为浙中王门，李贽当属泰州学派。从师承关系而言，李贽当属于泰州学派王艮之子王襞、泰州学派罗汝芳的学生，但同时也受王畿的影响较深。泰州学派、浙中王门将阳明学发展成赤手搏龙蛇的精神，可谓风声鼓舞，门徒遍天下。但泰州学派、浙中王门的流弊也最多，“堕廉耻”“廉耻丧”指向以“无善无恶”为宗旨的王畿学说的流弊，“怠于明伦察物而求逸获”批评的指向王畿对于儒家高明一路的发挥，“无忌惮之教立”针对的正是泰州学派猖狂精神的流弊。“充其无善无恶、圆融事理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15]。指向泰州学派与浙中王门的末流。“肤发可以不顾”显然是指李贽剃头当和尚一事，但这种个案并不具代表性。“乡愿之祸，极于焦竑、李贽。”焦竑出自泰州学派的罗汝芳、耿定向之门，侧重于儒释道三教的圆融，或许因此而被船山指责为乡愿。

江右王门是阳明后学的中坚力量，或许因为船山之父从学于江右王门的邹守益之孙邹德溥，船山则批评较少。江右王门是平衡泰州学派、浙中王门流弊的主要力量，在阳明内部有着自我修正、调整作用。从阳明后学展开的实际情况来看，当浙中王门与泰州学派迅速展开时，张居正给予了残酷镇压，由此两个学派迅速跌落。当张居正死后，占据学术界主流的是江右王门，并与紫阳、东林、关中相呼应，构成中国的书院网络。不可否认，一些号称阳明后学之人在明亡时作出了错误选择，如王船山深恶痛绝的降清奸佞郭承昊。郭承昊为郭子章之孙，郭子章是胡直的弟子，从学术

渊源上便属江右王门。^[16]但知势不可挽，仍然起兵抗清、因劳而卒的刘同升，刘同升为邹元标弟子，邹元标亦是胡直的弟子，同属江右王门，船山称其“刘孝则先生诸公子，皆树立清节”^[17]。明亡时的选择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个人性格的软弱，又有家庭的顾虑、清军的残暴等，不能一概归因于学术。在明代亡国时，如江右王门的李邦华、李日宣、刘同升等与大明同生死；北京外城陷，李邦华走宿文天祥祠投缢而绝，李日宣绝食死，阳明后学诸多忠贞之士力挽狂澜，怎么能说成明亡的祸根呢？

三

船山认为阳明“屈圣人之言以附会之，说愈淫矣”^[18]，他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为己任，力图在经典诠释上推翻阳明学，重建儒学正统：

姚江王氏出焉，则以其所得于佛、老者强攀是篇以为证据，其为妄也既莫之容诘，而其失之皎然易见者，则但取经中片句只字与彼相似者以为文过之媒，至于全书之义，详略相因，巨细毕举，一以贯之而为天德王道之全者，则茫然置之而不恤。迨其徒二王、钱、罗之流，恬不知耻，而窃，佛老之土苴以相附会，则害愈烈，而人心之坏，世道之否，莫不由之矣。^[19]

阳明学中重要的概念主要源于《四书》，而其中以《大学》《孟子》为主。此节引文批评阳明是阳儒阴释，表面是儒学，实质是佛老，借助儒家经典附会佛老学说，此节批评重点为阳明对《中庸》的误解。

《中庸》极广大尽精微，船山认为阳明附会的是尽精微的方面，侧重内圣的心性层次；而对于极广大的方面则茫然置之而不恤。内圣与外王为儒学的车之双轮，不可或缺。单就阳明而言，他的内圣心性之学与外王的事功在明代当属一流。从阳明后学狂禅异端的流弊来看，船山的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果攻击阳明本人不恤外王之功，则显然过于偏激。

船山攻击阳明取经中片句只字，借助儒家经典附会佛老学说，主要指阳明对于“格物”“致知”的诠释：

自姚江王氏者出而《大学》复乱，盖其学所从入，以释氏不立文字之宗为虚妄悟入之本，故以《章句》八条目归重格物为非，而不知以格物为本始者经也，非独传也，尤非独朱子之意也。既不揣而以此与《章句》为难，乃挟郑氏旧本以为口实，顾其立说又未尝